

吞挑峒首

王海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NLIC2970867937



吞挑峒首

王海 著



NLIC297086793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吞挑峒首/王海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307-10214-9

I. 吞… II. 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0091 号

责任编辑:张璇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364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0214-9/I · 615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买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达乎极乐的返乡忧心

——序王海小说集《吞挑峒首》

郭小东

黎族的作家文学，是南方文学特别是海南岛文学的一颗痣。这痣的颜色、大小、质素，虽与总体上的观感无伤大雅，但它的存在、有无、大小、文野，却是上述文学格局中不可忽略的印记。

海南岛的黎族，有 100 多万人口。海南岛的文化传统与乡土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讲，黎族文化是其中最为耀眼、独特、无可替代且最值得珍重的部分。可以说，黎族文化就是海南岛的文化之魂，也是海南岛之所以置身世界格局并让世界目光有理由穿越海南岛的重要原因。海南岛从纬度上说，是东西方贯通的最短的“中途岛”。它在世界地理格局中的这种特殊位置及其在文化上可能延展的价值，似乎至今未为岛人认知，并引为翘楚且为倨傲。在文化建设上，海南岛不单被长期忽视，同时也处于被掠夺的形势……说得太远，打住，还是回到本题：王海的小说创作。

在当代黎族作家文学中，王海作为黎族作家，他的身份及所处的文化地位，非常特殊，可说是当下黎族作家文学格局中，最具文化特质的一个。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诗人的天职是返乡，唯通过返乡，故乡

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守护那达乎极乐的有所隐匿的切近之神秘，并且在守护之际把这个神秘展开出来，这乃是返乡的忧心。”这种言说中之返乡，是一个作家能否真正真实地走进灵魂的驻地，走进民族魂灵驻地的决心，并使民族灵魂在自己心中重生、滋长的前提。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乡愁及对乡愁的倾情，也不仅仅止于通常游子对故乡的回望与追忆。忧心如焚的追返，向民族源头的重新寻找，有一种溯源的冲动，以及阅读每一历史进程的细节，舔舐每一民族心理迁徙之履痕的急迫，那是曾经被抛离被异己之后的一次回扑。其中之细微玄妙迷离之处，是外人难能真切把握的。

在我认识的黎族作家中，对本民族文化、文学的现代建设，对之省察之急迫，对之的忧心与乡愁的殷切，王海是最为理性同时最为情重的。这种情绪与格致，表现在他的小说中，自然也浓重地体现在他对民族文化的省察之中。而其背后的原因，正是我在研究黎族文化与文学的过程中，尤感兴趣的地方。

王海不同于所有黎族作家的，是他尤为特殊的文化身份及他藏匿于这种文化身份之中的民族成分。这种与生俱来的民族成分曾经沉匿，并未成为他的一种意识与心理自觉。它们的苏醒与认同，是在他长大成人，20岁之后的事情。严格说，也即他在1977年高考之时：黎族，作为族别也作为文化符号，从现实也从心灵同时予他以重视与强调。他从此将作为“黎族”重新出世。他的人生便开始适切另一种文化与民族的命名与仪式。命名与仪式是一个人生命生长与文化生长的生命标志。而此前与之之后的生命景观之裂变所产生的矛盾冲突，怀疑与困惑，将成为一个作家在创作中的印痕，也将是他的作品中最为炫目同时深富文化意味的价值所在。

土生土长的黎族作家诸如龙敏、亚根等人，他们的文化长成，有着浓重的文化自守和保全。他们与外界文化的链接，更多来自一种被启动被影响被关照的势能。而王海对自我民族身份的重新认定，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对民族生存与精神存在的责任与使命，则是在多种文化视野与观照下，对自我的一种省察与彻查，一种在充分比较的基础上的追问、诘疑与挑战。其中的困

惑与释疑之范围与边界，将超越民族的界限而融入了多民族的文化交织之中。他对本民族的文化判断和评价，有可能更达至客观、宽容与大度的气象。在文学创作上，他基本上摆脱了民族的狭隘心理，而使其叙事的格局，进入人类文化的历史视野之中。虽然一民族一文学在反映表达民族的心灵诉求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民族自卑与民族自大杂糅衍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王海这类作家的创作中，自然也是难以回避的，但至少，于他可能减持到少与薄弱的程度。这种减弱的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忧心”这一哲学命题，也即民族文化心理的焦虑。它们是相反相成的。程度越低，忧心越多。王海的创作呈现了这种文学的心理态势。这也是他优胜于其他本土黎族作家的地方。

在《吞挑峒首》中，他对某种现象的评价是准确的：“奥雅的权位是世袭的。如今，时代变了，大队、生产队的组织行政结构早已替代了过去峒和村寨的关系，奥雅不必像过去一样事无巨细都得费心劳神、发号施令。但是，奥雅还是奥雅。奥雅的威望是不变的。”具体部落或环境里的奥雅，作为个体生命，也许并不尽相同，但是，这里道出了一种文化秘密。文化自有一套自行其是的密码与解密方式，少数民族文化尤其如此。因其各少数民族本身文化沿革及部落制度的相异性，它们的文化基因中，与现代社会、现代性的文化生成，既有着某种文化共通，又不乏某种牴牾。某种今天看来深富现代性的文化制度与组织制度，作为萌芽时代的成熟形构，早已在少数民族部落社会上根深蒂固。黎族社会内部结构，并未进行过激烈的内部革命或阶级斗争。“民主补课”的改造方式也未对民族内部制度形成破坏性的意识形态结果。故作为民族的象征地位和力量源泉的奥雅，因其权力与身份的世袭制度，并未从根部上被铲除。他们的文化权威，始终是民族内部结构变动的决定性力量。

王海的文学创作，因为这种体认而有了某种文化的保证。保证了民族文化与乡土风俗包括人物性格及叙事细节在文学中的纯度，起码他保证了汉族文化在同化少数民族文化过程中，那种天然的抵抗及在抵抗中的妥协，妥协中的变通……它们是如何经历博弈的艰难与纠结的。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文化问题。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民族文学创作。少数民族

文化在与他民族文化，特别是在较之更为强大强势的民族文化与文学面前，如何坚守自己的文化自尊，同时又敞开胸怀，接纳他民族的文化影响甚至强势进入的形势，并有效排除政治意识形态干扰而进入一种比较正常的文化交融状态，从而符合现代社会的各种文化要求，得以获得同步的发展。

这种基准的明朗，使王海的小说创作一开始就进入一种良性状态的可能。发表在《民族文学》中的小说《芭英》、《帕格和那鲁》，事件与人物，都隐匿着由此而来的民族文化自信。芭英的母亲在谈到女儿生父时的口吻：“我是在他参军后第二年他回来探家时怀下你的。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已经一岁多了。我们结婚不到三年就离婚了。他后来那个女人很漂亮，是汉人，他那时做了带领一百几十人的大官了。他是带着那个女人回来结婚的。那女人好白，好嫩，好娇气，天天要刷嘴，弄得满口都是白泡泡。他结婚的时候，公社书记都来喝喜酒的。”

小说接着写道：“母亲声音甜甜软软地说，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说到父亲，母亲好一会儿才眼眶湿湿地苦笑说：“一个是生你的，一个是养你的，加起来就两个了。”

还有小说中对继父的描写：芭英的继父出田回来了，见母女俩手执照片默默无语，便开口笑道：“又在想念你们的亲人解放军呀。”

“继父是个好阿爸，真阿爸。”

小说说出的是一种通达的日常的伦理现象，几笔所勾勒所描写的是几个人物瞬间的日常细节，而整个语境及其后所滋养着的，却是一种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黎族的历史生活风俗，其间隐伏着的文化符码和信号，却非三言两语可以笼括。黎族的婚姻、爱情、家庭，其文化伦理注重于生殖崇拜暗示，即便社会如何发展前行，只要这个民族的语言风习及生存环境的地域性规约没有太大改变，则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便无消失的可能。在很长时间里，黎族的婚姻仍然保留着古代习俗，即“不落夫家”，面对其养子却又“视同己出”。对生命之重视，并不忌讳亲生与否。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大大强调了女性的地位尊严和文化尊严。依然有母权

制的遗迹。“黎人气习慁悍，与其同类一言不合，持矢标枪相向，有不可遏抑之势，若倘妇人从中一间，则怡然而解，亦俗尚相沿如是耳。”小说细节及人物性格演化的文化理据，是王海小说尤为注重同时又不着痕迹地加以表达描述的重要部分。

王海在 20 岁之前，并无在海南岛黎族故乡长期生活的经验。对这个民族的文化了解也相当有限，这种文化距离加上他后来从事民间文学教学及民族文学创作，反而成就了他对民族文化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上升为文学创作的间离状态，使之小说的理性把握拉近了对民族生活的感性距离。这就有别于其他创作形态的民族作家，他们的无距离写作，使之难以蜕尽民族生活附加其上的文化羁绊与阴霾。王海比之多了若干观照的视角，多方位的审视结果使他对民族生活的认识和文学的关系，有了更加娴熟透彻的理解。学术进入生活分析的关键之点，是将其民族的日常生活细节和伦理现象，做出准确精致的判断与叙事，故在小说便凸显或隐匿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话语，民族文化的文学表达话语。这里面的观念及文化价值，构成了王海小说中最重要的元素。

对于民族作家而言，只有做到精神上的返乡，方能守护达乎极乐的切近与神秘，并将之有效地展示，对于小说而言，便是叙事的忧心。

王海的小说，大多发表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客观地说，他小说的 80 年代印记并不明显。时代的意识形态及文艺风向、风势对之的影响似乎并不特别鲜明。这种评断似乎有割裂或忽略时代与文学的关联之嫌。但是，从今天的阅读感受及对作品产生年代的客观审视而言，王海小说的意识形态痕迹，或当时的习惯性叙述的气息，似乎并不太浓重。其中因由，我以为并不费解。

王海的小说创作发端于 1970 年代末，在 80 年代的文学热潮中，他并无自觉追捧的趋向。由于是返乡：肉身的返乡与精神的返乡，两者的吻合使他对乡土的民族生活有一种新鲜却又不失隔阂的印象与感觉。他的文学热情全在于那些依然生存于深山森林中的人物身上。那是一些最古朴，保持着基本的原始生态的人们。千百年的历史变迁，在他们身上似乎有所触动，又是那

样的迟滞。20 世纪 80 年代的黎山，依然是夜不闭户，依然是刀耕火种，依然是一把砍刀一杆猎枪……这种生存及生活方式，并未因“文革”及现代生活风尚而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庄在丛林里，而丛林里依然有男欢女爱的“布隆闰”，依然用刀砍鱼，用狗吠山（打猎），用火烧垦，依然是广种薄收的点种山兰，依然是一片片的船形屋。民族特色全以日常千百年的平缓生活表达着，形构着。

王海接触的是这样的民族生活与人生。外界翻天覆地的文艺思潮、政治风云，似乎与这里的生存状况并无太大关系。小说便以临摹的状态，进入生活。

可以说，王海如实地感觉着面前的一切，无意中在小说中形成了一种间离。他自己既游离于这种生活，又急切地探询并代言这种生活，同时又从这种生活中，打捞并抽离着对这个陌生着的自己的民族的文化认识，继而写下了大量与此相关的小说。《五指山上有颗红荔枝》、《被荒草掩没的坟茔》、《我家门前有条河》、《失落在深山里》、《弯弯月光路》等。它们纯粹、平实，诉说着民族新生与蝉蜕的种种干涩与圆通。他如实描状的结果，是他远离了当时的种种思潮与意识形态的文学考虑，而进入了生活故事，心灵写照，并把一切关系，依照民族千百年的生活法则，予以简单形象的处置。所谓的丑，亦复小丑，所谓恶，亦复与善有关的恶。民间文学的审美原则，坏人全坏、好人全好的传统精神虽然并不可取，但在民族的纯真年代与简单生活中，亦非全无道理。王海的 80 年代小说，给出了我们许多久违的美丽传说。

王海是黎族百多万人口中，寥若晨星的几位文学教授之一。他于 1970 年代入读中文系，成为我的学生。我是 77 级中文系的班主任，我和他一起，主编了大学的学生社团刊物《野草》，师道鲁迅先生。他后来留校，和我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既讲当代文学，也讲民间文学。本集中的小说，就是他在教学之余写下的。

海南岛的黎族，已经涌现了一批作家，但作家的学者化，或说学者型的作家，在黎族创作群体中，王海是仅有的一位。故他的小说创作，便有一种

模范的意象。他自然是黎族作家中最优秀的一员。

由师生而同事、同好，王海的小说集即将问世，嘱我为之写几句话，却之不恭。

是为序。

2012年3月16日

序二

生活的年轮与忧伤的世界

——王海教授的小说世界

周建江

海南当代黎族文学创作，近年来一直处于较为活跃的状态，其间，王海教授的努力功不可没，《吞挑峒首》小说集便是海南当代黎族文学创作代表作之一。

王海教授不是在海南本岛出生的黎族，长期生活、工作、学习在大陆，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于本民族的强烈认同，以及对于黎族文化、文学的深深热爱。三十年来，王海教授用自己的民族文化彩笔描绘着自己家乡的山山水水和风土人情，其中既有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展示，也有现代文明冲击下传统黎族文化的生存写照，更有着当代变革中黎村黎寨黎族人民的情感生活世界。更为重要的是，王海教授在自己的作品中寄寓了强烈的文化批判精神，一方面是“反思”，另一方面是建构。当然，由于长期学界的生活经历所致，王海教授的作品存在着浓浓的忧郁情调和强烈的感伤色彩，而这正是黎族文化的形态之一。

黎族生活画卷的徐徐展现，是《吞挑峒首》小说集最令人向往的核心内容，这里面有着赶帕阿公的尊贵，也有着帕那爹的善良；有着黎族青年男女的爱恨情仇，也有着黎族阿妈（米雅婆）的期待；有着传统的黎族民俗，也有着黎族的新风尚和新道德，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描绘了黎族人民的精神世界，散发着民族文化的审美情趣。赶帕阿公是吞挑峒的头人——奥雅，在这里，没有尖锐的阶级压迫与阶级对立，更谈不上阶级斗争。虽然说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已经将半奴隶半封建的社会组织结构彻底铲除，况且“时代变了，大队、生产队的组织行政结构早已替代了过去峒和村寨的关系”，但在黎族人的意识深处，“奥雅仍然还是奥雅，奥雅的威望是不变的。”所以，赶帕阿公虽然坐在自家的房前，但每个过路的黎族本寨峒的成员，都必须向他表示敬意。峒民帕列赶牛去耕田，看见赶帕阿公便先问他汇报本寨发生的鲜事，事毕，一句“去吧”的话语，一个“挥筷子”的简单手势，一个“没抬头”动作显示出赶帕阿公的权威性。当“后生哥传巨”没有规矩，缺少黎家应有礼数而经过赶帕阿公面前时，虽然毕恭毕敬地上前打招呼，但还是被赶帕阿公教训了一番，灌输了一番自认为合乎黎族传统文化的教导。为此，赶帕阿公“心满意足地挥挥手”，再次向世人展现了他的权威性。对此，赶帕阿公是十分在意与竭力维护的。因此，当听说本寨峒的村民比献回到家来，便一心等待比献上门问候请安，却整个下午不见比献来，这让赶帕阿公很是气恼，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或受了蔑视，一肚子气，见什么人都要发火教训，见什么事情都不顺眼，直到自己的儿子回家后讨好地解释，赶帕阿公方才心情舒畅一些，恢复了尊严。“这一夜，赶帕阿公倒头便入梦乡，睡得好酣畅，好沉实。”《吞挑峒首》用简单的事件和淡淡的生活细节，向我们展示了黎族生活的画面，这在海南岛日渐消亡的黎族民族文化的今天，难能可贵。同样的黎族生活情景也在《芭英》小说中得到表现。芭英

曾经有过自己的恋爱对象，自从嫁到番板寨后，虽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但挥之不去的是初恋情人的身影，加之自己的丈夫缺少生育的机能，造成了芭英在私生活方面的自由。但在她心底永远是对纯真生活的向往，这就注定了芭英今后生活中的悲剧。所以，当初恋人比献回到峒寨后，让芭英很是难为。小说没有写完结果，就此打住。在我看来，这篇小说并不是在对芭英生活的描写让我感动，而在于其间的一些黎族传统文化生活片段让我投入。黎族女儿出嫁路上的哭歌，婚礼仪式时斩鸡，亚贵和亚贝的黎族祖先的传说，黎族的纹身，黎族儿女婚前的性生活，这些在黎族的现代生活中已渐渐淡然，某些习俗因为落后性而被废弃。《芭英》小说由此因为黎族生活画卷的陈列而成为富有生命力和生活性的作品。当然，《吞挑峒首》小说集从文学的本义来讲，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表露。《五指山上有棵红荔枝》里的米雅婆，因为丈夫的去世，按照黎族的传统习俗，是不能在没有自己亲生子女家中继续生活，是要回到娘家的。对此，“米雅婆的天塌了半边，一切都变得混沌了。”面对死去丈夫的儿子在那里积极操办米雅婆今后生活事宜的举动，“米雅婆好伤心呀。但她不怪儿子儿媳，他们不是亲骨肉，可也已经尽了孝心。”所以米雅婆只有等待和接受命运的安排。

水塘边那两颗高高的椰子树婀娜多姿，粗壮挺直的腰杆上，那一圈圈坚硬的树结像刀砍一样清晰，可以想见它们早已长出了密密的年轮，却仍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树是不像人那么容易衰老的，瞧那挨挨挤挤的大椰果挂满了树端，它们一茬接一茬地更替，总是那么丰硕。这两颗椰子树，还是当年米雅婆嫁到香冲寨举行婚礼那天，按照风俗，和丈夫一块亲手种下的。树长大了，结果了。儿子也大了，娶了媳妇生了孙，而种树的人却要去了……时间留不住，人总是要老的，米雅婆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也不应该有什么抱怨。

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米雅婆的预想，在解决米雅婆今后生存的家族会议上，儿子帕丰提出了让米雅婆今后和自己一道生活，还像父亲当初活着时候一样，大家和和美美，其乐融融。小说写到这里，极是感人，充斥着浓浓的

人间挚爱真情，也表现出黎族儿女在新生活年代里，走出了祖训，开创出新的生活。

帕丰端起米雅婆的酒碗，双手举到米雅婆面前，深情地说：“妈，我是你养大的，你比亲妈还亲，我也从来没有把你当后妈看，这我心里非常清楚。你辛辛苦苦一辈子，没有过多少舒心日子，阿爸去了，让你走我良心上过不去。现在好容易日子有了盼头，生活比过去好了，你更应该有个幸福的晚年……我和你儿媳妇商量过了，也和开龙爹、舅舅讨教过，决定让你留下来……”

米雅婆愣怔了片刻，颤巍巍地接过酒碗，任凭那唰唰的老泪滴落在酒碗里，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真像是做梦，可又实实在在不是梦！米雅婆明白了，她毫不怀疑，一定是她在那次病中昏睡的日子里，她的梦魂上过五指山，吃过那颗红荔枝……

同样细腻的黎族同胞内心情感世界的描写也体现在《梦中的彩虹》小说里。帕那爹为了心中的一个梦想——为村寨建设一座桥，多少年来忍受着村寨中人们的种种议论，打破黎族不能经商赚钱的古训，割断与村寨中人的“亲情”，努力地攒着修桥的钱。为了这个梦想，帕那爹曾经偷了镇里老师屋前窗户上贴的窗纸而终生不能原谅自己，直到在弥留之际还在老师面前希望讲清楚这件事情，求得自己心灵的安宁。虽然帕那爹的梦想永远不能实现，“因为那条小河对人们的日常出行影响不大，似乎并无建桥的必要；况且仅靠他攒下的那些钱，想要建造一座大桥（窗纸上“南京长江大桥”的样式），似乎有如杯水车薪……”但帕那爹内心的追求却是普普通通黎族人民纯朴善良本性的体现，尤为珍贵。

《吞挑峒首》小说集没有停留在单纯展示黎族民族文化和黎族儿女纯真质朴的思想感情层面上，而是进一步深入到黎家儿女的思想意识深处，探索发掘他们的生活观，尤其是渴望新生活的追求上。《轻风，掠过夏日的山坳》里的山女、龙梅、春妹三位黎家女孩，打小在山里生活，从未走出山外，如果

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发生，或许她们永远安生于自己原有的生活，在平静的生活中重复着祖先以来一直有的生活方式。在一个夏日的白天，三位黎家女孩在劳动之余于寨口的小溪处玩水，不料却被一位戴眼镜的外乡后生哥发现了，进退不是，由此引发了争执。在争执的过程中，三位黎家女孩了解到山外世界的精彩，引起她们的好奇，决定走出大山的包围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农忙过后的一天，三位黎家女孩大胆地相约出山，问路才知要翻五座山，还要坐半天的车。如此的困难打消了三位黎家女孩走向山外的信心。一年过后，三位黎家女孩分别出嫁了，依旧在大山里生活，她们不知道山外的世界究竟怎样；更重要的是，她们“也不想知道了”。这篇小说从黎家儿女的精神意念写来，探讨她们的精神世界，在思想追求与平复的过程中，完整地再现了黎族文化中积极和保守的一面。在当代新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这样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展示实为难得。因此，《吞挑峒首》小说集中有关黎族文化的展示成为黎族文化的活标本，我们能够由此走进黎族的文化世界中。

身作为一名黎族作家，王海教授对黎族文化有着深深的挚爱之情，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在王海教授那里是强烈的。正因如此，王海教授虽然是岛外黎族作家，但他对于黎族的生活观察之深之细之精到，使得他可以看到许多细微的地方，从中发现生活的本质和意义。赶帕阿公坚守着自己奥雅的身份，处处从自己是首领的观念出发，是因为黎族文化中尊老观念的根深蒂固，以及对于黎家儿女影响之大。虽然在新形势下年轻人的观念多少有些变化，例如后生哥传巨虽然并不在意赶帕阿公的批评，但至少在当面还是要俯首帖耳听其训诫，虽然在走出赶帕阿公的视野之外后，传巨故态依然，“走近一颗树头。扯低裤头，憋足一口气撒出一泡长尿。完了，边抽裤子，边就哈哈大笑。随后又拿起枪，照旧横在腰后，照旧一步一颠地上了路，边走边哭似地唱起了一支‘闷调’歌。”但是在赶帕阿公训诫时，传巨还是“规规矩矩地扛起枪，脚步迈得稳稳地小心离去。”赶帕阿公也不是那么传统守旧的人，黎族文化中相亲相教相爱的美好品德，让赶帕阿公在得到几句尊敬的话之后，便心情舒畅，又过起自己从容的生活。前面引证过的《五指山上有颗红荔枝》将

文化触角指向人的心灵世界，从“五指山上有颗红荔枝”的美丽传说的文化精神写起，彰显出黎家新一代的尊老品德，与传统文化照相辉映，演绎出新生活的美好和黎家儿女的精神情操。至于《轻风，掠过夏日的山坳》更是对文化精神的指涉，在黎族文化中，多种因素共生共存，互相影响，尤其是其中对于新知识的渴望与认识上的懵懂和行动上的归于平静，正是人类探索精神的写照。因此，王海教授的小说具有智慧的灵性和理想的光芒。除此之外，在王海教授的思想深处，还有着强烈捍卫民族文化的意识。《阿龙》里的黎族青年阿龙已经27岁了，还是光棍一条，但他并不因此而自卑。虽然在与女性谈话时不时地解释着什么，但一当涉及黎族的民族身份时，阿龙便是另一番面孔。“前不久一位姑娘邀他看电影，到了电影院，时间还早，他们便在宣传栏看自卫反击战的宣传图片。那姑娘无意中指着一幅越南俘虏兵的照片说：‘你看这些越南兵多像黎族人呀’。阿龙一听，怒目圆睁，就差没给那姑娘一个耳光了：‘你别胡说八道，黎族人难道就是这个熊样的！’说完，气冲冲地走了。”《我家门前有条河》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汉族年青人到理发店理发，面对自己的发型，抱怨理发师给自己理了一个“黎头”，招致旁边等候理发的黎族青年人的反对，“什么是黎头，什么是汉头！”并揪住那个青年不放，“你说清楚，黎就随便给人侮辱吗！”在这里，决不是什么民族狭隘主义等说辞所能解释的，而正说明王海教授对于自己本民族的敬重和维护，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尤其是自我身份的认同。这些在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黎族文化正是《吞挑峒首》小说集有着强烈民族特色的所在，更是该小说集的成功之所在。在这点上，王海教授的民族作家身份同样是鲜明的。

二

上世纪70年代末，王海教授开始文学创作时，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属于热血的文学青年。受到自身曾经有过的坎坷经历和不堪回首的岁月洗礼，加之当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学大潮的裹挟，王海教授也加入了

当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创作的大军，创作出若干篇此等主题的小说。收录在《吞挑峒首》小说集中的《记忆中的小路》、《我们曾经也年轻》、《被荒草掩没的坟茔》、《我家门前有条河》、《采访》等小说便属于这一类。它们在这部小说集中思想性最明确，且作者所著功力也最多。

与当时从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文学创作的大家或有影响力的作家相比，王海教授的这类小说没有坚持强烈的政治功利性标准。坚持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势必要牺牲作品的审美功能和艺术价值。王海教授的这类小说指向社会人生观，表现当时的社会生活对于参与其间人物命运际遇的影响，他们的心理、情感、希望，从而有着较为丰富的人生感悟和命运的历史感，重在个人心灵世界的放大，在王海教授的这类小说里，情节是平淡琐碎的，但富有生活情趣，有着较多的细节描写以及场景氛围的铺设渲染。这正是曾经风云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走向新生的路途。王海教授的这类小说做到了这一点，为自己今后的小说创作铺就了较为坚实的思想文化的基础，成为自己今后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此情可待成追忆。“伤痕文学”或“反思文学”重在表现过去的极端政治岁月对人心灵世界和肉体的创伤。王海教授的这类小说也是这样，只是在表现时候更多地是从追忆的角度写起，描写那段荒唐残暴的社会对主人公的迫害，以及形成的灰暗心理影响到主人公多少年后的行为及行为方式。作品虽然没有讲说什么宏大主题和鲜明的政治观念，却从人物的毁灭层面上控诉了那段岁月遗留下来的深深的伤痕，留下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给后人。《记忆中的小路》中篇小说属于代表作品。

《记忆中的小路》从大学毕业生杨野回到自己故乡探访写起，从当前所经历和所遇到的事件及人物，引发杨野回想当年的生活岁月，在随意式的流水叙述中，展现一颗幼小的心灵如何在生活中饱经摧残，并扭曲结下苦涩的果实。小说以顺述的线索铺陈当前的事件或人物，以倒叙的方式还原生活的本相，并丰富当前事件和人物的圆满程度。小说周旋于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于记忆和眼前之间，更多地以记忆中的事件和人物验证当前事件和人物的生